

陕西文物外译的生态适应型模式研究

胡学坤

咸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论文探讨了陕西文物外译的生态适应型模式, 指出陕西文物外译成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 从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三个维度分析了陕西文物外译过程中的适应策略。论文提出了“多维生态适应模式”, 强调委托方、译者和接受者需共同参与构建适应性的翻译生态,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兼顾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的平衡, 以实现文物信息传达的功能等效, 拓展了生态翻译学的应用边界, 为文物翻译研究提供系统性分析框架, 为陕西文物国际传播提供可操作的外译策略, 丰富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文物内涵。

关键词: 陕西文物; 外译; 生态适应; 多维翻译

Research on the Eco-Adaptation Model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Xuekun 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with a focus on its Eco-Adapt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re analyzed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from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s. A Multi-dimensional Adaptation Model is proposed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need for clients, translators, and recipients. It is stressed in the paper that translators shall maintain a dynamic balance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o achiev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This approach used in this paper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offered with a view to spread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translation; Eco-Adaptation; multi-dimensional translation

0 前言

文物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其对外译介是翻译和文化传播的融合。陕西文物遗存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文化内涵深厚,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 陕西文物外译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路径。文物翻译是文化解码、跨语境适应与再生的复杂过程。当前陕西文物外译实践中仍存在文化信息流失、译介策略单一、受众接受偏差等问题, 亟须从生态视角探索其适应性规律, 以实现文物信息传达的“生态平衡”。

生态翻译学理论由胡庚申教授提出, 强调翻译活动需遵循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原则, 在翻译过程中兼顾文本生态、文化生态与交际生态的动态平衡。陕西文物外译是一种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生态移植”过程, 需通过多维度的适应转换, 既保留文物本源的文化因子, 又实现目标受众的认知共鸣。本研究拟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框架, 从语言生态、文化生态、交际生态三个维度分析外译过程中的适应路径, 构建具有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陕西文

物外译模式。

1 生态适应理论导入

生态翻译学的哲学源头是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思想。要求译文和原文内容和谐统一, 以译为本, 实现翻译和翻译生态环境和谐一致。这一理论的奠基人胡庚申教授指出了“三维”转换法, 即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同时转换。陕西文物外译的终极目标是让受众理解陕西文物的文本内涵, 实现文化传播。鉴于当前陕西文物外译的探索不够系统, 笔者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话语, 引入生态翻译学模式构建作为有效的形而上的理据。

1.1 陕西文物外译的哲学思考

西方主流译论中的理论翻译学, 描述翻译学、应用翻译学都不反对从某一哲学派别来研究翻译, 也试图构建独立的翻译哲学话语体系, 然而其研究素材主要来自西方国家, 哲学理据是西方的, 偏向实证研究和逻辑推理, 直接用于陕西文物外译研究有些水土不服。

“一个民族的人文学科理论观念要接受本民族哲学思

想的决定性影响^[1]。”陕西文物外译是一个涉及“译什么、为何译、由谁译、译如何”的综合过程，各环节均在翻译大生态中进行，涉及翻译研究中的目的论和方法论等哲学思考。陕西文物外译是大生态中的小生态，其理论构建需要厘清研究中的本体、客体、主体、载体，其涉及发起者、译者、验收者、接受者的多维实践，是完整的生态体系，受政策环境、历史环境、传播生态、学术生态、商业生态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因此，陕西文物外译的哲学根基并非建立在“客体”与“本体”二元对立的本体论之上，不存在绝对的原文第一性、译者第二性，而是要追求原文和译文统一、客体与主体统一、小生态和大生态统一。

1.2 陕西文物外译的理论构建

陕西文物外译是大外宣翻译的核心之一，服务于传播中国价值观、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提高中国声音的大战略，其外译理论构建是一个综合工程，要解决译前人才培养、译员遴选、材料筛选，译时二元统一、目标统一、方法统一，译后效果评价、问题总结等问题。在构建陕西文物外译的生态适应研究中，既有普通哲学的通识原则与术语，也会创建文物译介的专有术语，甚至借鉴传播学领域的用语。为了有效“走出去”，第一步是有效地翻译，其评判依据是受众的接受效果。其本体论在于探索外译的属性；认识论在于对外译进行界定，认识到方法是基于最终目的基础之上，译前就要心有目的。陕西文物外译架构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之上，要讨论译何、何译、怎么译、译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实现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相统一。译介要解决三个分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把这三个问题放置在生态翻译学的整体框架下研究，得出和谐统一的翻译生态模式，生态翻译学是灵魂，三个子体系是骨架，翻译工作者的实践和心得是支撑，共同架构出陕西文物外译的适应体系。

目前研究文物外译的理论不够宏观，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翻译大生态却没有深入探讨，而基于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生态翻译学正好有助于应对文物外译研究的困境，可以解决材料筛选、策略遴选、译文评选等问题。生态翻译学具有跨学科属性，从生态视角审视翻译，实现理论和理论和谐统一。陕西文物外译的生态环境是源头语、原文本、目标语所构成的生态圈，圈内有委托方、原作者、接受者等主体和语言、文化、社会等存在要素构成的相互融合交织的整体，这个生态圈制约着翻译实践，便于根据目标做出优化的适应性选择。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平衡系统，委托方和翻译者的目的要平衡，接受者和原文思想要平衡，只有内在平衡统一，翻译活动才会顺利推进。评判文物外译效果的核心因素是看其是否实现意义平衡、风格平衡、价值平衡、审美平衡等。从翻译生态学看来，陕西文物外译的过程就是取得各种平衡关系的过程。第一步是翻译生态大环境对译者的挑选；第二步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的各个要素，而取得平衡的译文。翻译的生态选择包括根据大环境选择译者，然后译者参与塑造翻译大生态，同时也受到大生态的制约。

生态译学认为翻译工作者的第一要务是维系原文本的生态。由于源头语生态环境和目标语生态环境的文化心理、思维习惯、社会环境的非统一性是构建新生态的阻碍因素，译者要主动适应，实现忠实与通顺的和谐平衡。优质的文物翻译是译者通过主动取舍、选择、调和、适应的结果，基于生态适应理论的文物翻译追求的动态平衡是在翻译大生态、社会大环境中综合处理的结果，是最平衡的，最适应生态的，实现这一最平衡的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是“多维转换”。

2 陕西文物外译的生态平衡过程

翻译适应论，自古有之。《大智论抄》序中曾言“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美国翻译家奈达认为译者要做出选择与处理，以适应另一种文化、语言、编辑、出版商、读者群。本部分探讨陕西文物外译时译者要适应什么因素，如何适应，作何选择，如何选择。适应性选择与译者的价值观的关系，以及非适应型译者所做出的选择与非平衡译文的必然联系等。

2.1 外译的选择适应

语言和环境这两个要素密不可分，要么前者适应后者，要么后者适应前者，或者二者互相适应。人际间的语言交流是适应的过程，言语交际双方不断相互适应，以语言为工具进行的交流又是双方适应的结果。陕西文物外译的适应也存在语言适应和顺应的现象。语言应用是一个优选过程，使用者会下意识地选择最适应的表达，有语音适应、词汇适应、句法适应、篇章适应。陕西文物外译过程中的抉择是适应的过程，译者会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适应其所在翻译生态圈。一旦进入翻译状态，译者就会选择心目中合适的语言手段，这一选择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适应是动态的。顺应的过程是有目的的意识过程，翻译在特定语境中进行，是译者进行的主动型言语交际行为，既假设读者能理解所译的全部意义，又适应地选择能满足读者的理解需求的表达方式，这种假设与选择不是单一要素的点循环，是多种假设因子的集合，形成了制约译者的关联性。文物外译过程是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译者应把握理想的关联性以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译文是同原文相近的目标语语段。首先，译者必须有高度责任心，认真领悟文物的内涵，从而将其输出给目标语读者；其次，译者还必须了解目标读者的认知语境，这样才能在翻译中做出最佳选择，“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的累计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2]。”

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文化部落，而不是磨灭文化部落，也不是为了形成文化对立。“翻译适应选择论”设定了一个新角度，将人与环境翻译过程中，认为人是环境中的人，翻译是环境中的翻译，因此翻译和环境要和谐统一。透过“选择与适应”，文物翻译的注意力不再聚焦于文字与文字之间的转化规律和方法，而是放眼文化发展，放眼整

个文化大生态和社会大生态。陕西文物外译生态中有原文献、汉语和目标语所呈现的整体环境，也有文物材料写者、目标接受者、翻译发起单位等相互交织的世界。译介的过程也是译者适应性选择的转化过程，这一选择的过程就是语言

和表达的“适者生存”。文物译介要做到三适应：适应委托方、适应译文、适应目的语读者。无论如何，译介的过程必然是最佳适应选择的过程，不过这一适应选择更复杂。请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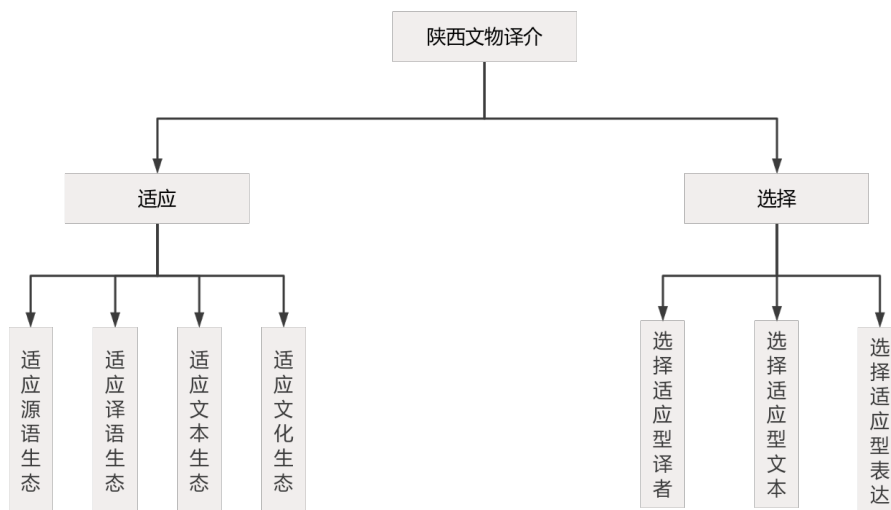


图 1 陕西文物译介

2.2 陕西文物外译的译者适应过程

翻译中译者在转换过程中必然发挥主体性，对译者的适应过程研究是整个生态模式构建的重要环节，在此从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来探讨陕西文物外译的适应过程。

2.2.1 语言的生态适应

语言是翻译中的核心因素，是翻译活动的基础载体和工具。译者的适应，首先是语言层面的适应，将原文本的意义转换到目的语环境中。语言本身是声音或者符号系统，其意义所表达的内容归宿为所指，人类通过语言的交际是基于意义而得出所指传达的过程。

文物外译将原文本的音、形、修辞、风格等形式层面的意义传递给目标语读者。浅层形式是指语言文字的图像特征，汉语是方块字，英语是字母文字，这种形式本身图像意义有异有同。另外，语言的组合顺序、表现手法、字面本义是语言的另外三个层次。通过对中英语言进行对比，汉语的词序、语法跟英语相差甚远。与译文有关的一切语言形式也是有意义的，适应性强的译文也需要将此表达出来，如果只考虑意义传达而不考虑形式再现，译作就失去了灵魂和风格。汉语和外语都是有规则的系统，语言规则和结构有别。这里有一个矛盾体，汉外形式不同，但是翻译时所表达的意义要力求相等，要“存义”必然要“变形”。奈达和泰伯认为“卓有成效的译者不会把一种语言的形式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上，而是随时作必要的调整，把原语的信息用目标语的独特结构表现出来^[3]。”具体到英汉两种语言，英语是形合，汉语是意合，英语中衔接词使用频率高，汉语的衔接是隐性的，主要靠句义的内在逻辑完成连贯。两种语言在书写和语音层次上，也存在巨大差异，汉语同音词多，同音的不同语

调就表达不同的意义。“语言干扰问题的实质，就是原文的语言结构对译者产生影响，使其不能用自然的译文来表达原文的意思^[4]。”在陕西文物外译时，译者应该有意将隐性转为显性，积极适应两种语言形式，取得最贴近的对等。形式不是空洞的，是表达信息的载体，为了使目标语受众感受到源语文本的原汁原味，译者需要尽可能保留源语形式。形式和意义本身是语言的统一体，形式是有意义的形式，意义需要通过形式呈现出来，“得意忘形”的翻译是不可取的，不是最佳适应的翻译。译介陕西文物时，真正的形式适应并不是套用源语的浅层形式，而是选择最佳目标语形式来传达源语的形式，实现形式效果的动态对等，使译作取得的目标语审美生态适应效果和源语的审美生态相当。

翻译从来不囿于某一条规则和方法，有效的翻译诚然要尽量适应原文的形式，以妥帖的语言再现源语信息。陕西文物外译时要传达言外之意，“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5]”。语言的功能是交际，这一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语言一旦在交际中使用就成了言语。言语的交际意义不仅有字面意义，还有言外意义。然而，源语生态和目标语生态存在天然差异，有时形式对应几乎不可实现，若拘泥于形式必然会破坏意义。因此，在两种语言的形式矛盾不可调和时，要侧重意义传达，让目标读者有效接收到原文信息。陕西文物外译的适应是动态的、双向的、双层的。所谓动态，指的是适应心理和适应活动会随着生态的变化而变化，目标语不同，适应选择也就不同，即便是同一目标语，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氛围下，适应选择也应当有所调整；所谓双向适应，指的是译者既要适应源头语也要适应目标语，只有获得平衡的双向适应，才能实现意义和信息的充分传达；所谓双层次，

指的是译者既要适应言中意义,也要适应言外意义,在有的交际状态下,言外意义适应显得甚至更重要。译文只有实现了双向、双层次的动态适应,才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2.2.2 非语言的生态适应

语言是翻译的工具,但是翻译研究绝不能止于语言转换。翻译本质上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之外的因素制约着翻译活动。源文本、委托方、译者、译文所处的生态由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政治氛围、审美心理、商业利益、舆论环境等要素构成,把这些非语言的因素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是翻译的新转向。陕西文物外译的非语言因素突出表现在翻译目的、受众需求、认知语境、意识形态。

目的论最早由弗米尔,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跨文化活动,不同的委托方的翻译的目的不尽相同,委托方的要求是翻译的实践指南,翻译实践服务于翻译的目的^[6]。陕西文物外译中决定译什么、谁来译、怎么译、译得怎么样的关键因素就是翻译目的,而翻译的目的通常由发起人和委托人决定,翻译过程中的其他环节都是为了实现翻译目的。一旦明确了翻译目的,中心地位就由发起人和委托人交接给了译者,然后译者以目的为本,采取适应目的的翻译策略。

陕西文物翻译实践中,原文本和译文是静态的,但译者和读者却是动态的。如果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接受心理,读者接收的信息就更保真,反之差异就越大。翻译要实现交流的目的,就需要适应目标读者的需求。“外国受众不准备,不喜欢去阅读‘翻译稿件’,他们要看的是地道的外文——内容和形式都十分适合他们的外文^[7]”。高质量的文物翻译应当是适应目标语受众需求的翻译。文物外译各阶段的主角处于动态变化中,译前发起方和委托方是主角、译中译者为主角、译后读者就变成了主角,检验译文质量的终极标准是目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效果。

陕西文物外译中的语境包括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文本语境,语境不仅约束理解,还影响表达。译者之所以要适应语境,是因为语境决定语义,同一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认知语境包括情景、上下文、背景知识,语境顺应是翻译的重要一环,译者的选择要与语境要求相适应。翻译的过程是作者、译者、读者跨越时空的交际过程,译者传达原文信息的过程就是为目标语读者提供认知语境的过程,译者需要先把握好原作的认知语境,然后通过顺应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选择最适应的译文。

Andre Lefevere 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集合,由某一历史时期里某一社会群体所接纳的观点和见解的总和构成^[8]”。(Bassnett & Lefevere, 2001: 48)意识形态具有群体性和时间性,单独一个人的观点不是意识形态,短时间的思潮也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译者和读者的影响是潜意识的,他们对文本的解读就是意识形态的再现。陕西文物翻译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中完成,意识形态操控了翻译的过程,翻译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翻译又形成意识形态。在陕

西文物外译中,当源语信息跟目标受众的意识形态矛盾时,译者需要主动调整表达,以适应目标语的意识形态。

3 三维生态适应模式构建

基于生态翻译学的观点,翻译是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过程。根据翻译所处的生态环境,译者选择保留什么维度,舍弃什么维度,获得的译文要适应目标语的生态。“多维适应”是评价译作效果的核心标准,如果译作实现了最优生态平衡,则是优质的译文。陕西文物外译中语言维是基石、文化维是保障、交际维是目的。

同其他文本的翻译一样,陕西文物外译也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不同的是此转换是单向的,都是将汉语译成外语。要想在转换中适应翻译生态,译者需要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尤其是异的地方。为了便于语言层面适应和选择,本课题将汉英两种语言的主要差异进行列表分析。在语言维度方面的平衡要求译者在语言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译者要同时适应英汉两种语言生态环境,以提高译文在目的语中的适应度和接受度。

陕西文物外译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语言承载着文化,文化通过语言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语言也随之进化。文物外译不仅要关注语言意义的传达,更要注意文化传递,充分考虑目标读者所处文化生态和可接受性。“译者所代表的文化势力与他所持的文化态度将会在译者的不自觉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制约着他的语言选择^[9]。”奈达和泰特勒对文化给出了基本阐释,都认为文化是精神层面的概念,萨莫瓦认为“文化就是特定群体在历史长河中所获得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实物的总和”。陕西文物译介实践中,对目的语读者而言,是一个对异国文化的认知接受过程,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文化再构。在外译过程中,译者是文化沟通之桥的“建设者”,但他既要尊重源语文化,也要适应目的语文化,要找准文化输出和文化适应的平衡点,做到忠实传播和效果传播相结合,实现源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和谐统一。翻译是一个文化舍得的过程,要想中国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译者需要顺应目标国的文化生态,必要时在翻译中舍弃一些非核心的文化内涵,接受度高、可读性强的译文传播效果才更好。

陕西文物译介中文化维度的翻译原则是“选择适应,力求平衡,效果优先”。外译的方式是灵活的,既不能全盘直译或者音译,也不能全部舍弃文化因素而归化。译者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根据译文和读者所处的文化生态做出动态的适应性选择,保持信息传输和文化传播的生态平衡。直译过多,可读性减弱,强行宣传反而会失去读者;归化过多,失去了文化,就违背了文献外译的初衷。因此,文物译者心中要时刻保持跨文化交际意识,时刻装着国外受众,在译介

或评论时可根据需要进行重组,让译文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生态,提高传播效果。

翻译即交际,陕西文物译介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要求把翻译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从交际维度来看,合格的译品应当交际通达,源信息要忠实完整地传达出来,译文读者得到的交际效果要跟原文读者得到的交际效果相当,交际效果未传达,就是对原文的背叛。这就要求译者根据目标语的交际生态和目标读者的文化生态做出适应性选择,字斟句酌,对原文“知神达意”,然后“绘声绘色”地、“知书达理”地完成对外译介。所谓“绘声绘色”,就是强调交际方式要适应目的读者群;所谓“知书达理”,就是强调原文信息要合理传达给目标读者群。实现交际维转换的选择技巧也是动态的,通过直译、意译、增译、释义等方法均可能有效传达陕西文物的核心信息。从交际维的角度看,译作既要传达原文的意图,又要适应目的语的交际生态。

4 结语

本研究致力于建构陕西文物外译的生态适应体系,推动文物翻译的研究与实践,提高文物外译的成效,对外传播陕西地区悠久的历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陕西文物译介的全过程进行了描述,认为是一个全程适应的过程,并针对译的环节提出了可行性见解。委托方在提供待译文本时要适应国内外的翻译生态和文化生态,在遴选翻译者时,也是从语言功底、文物知识面、责任心和职业精神等方面挑选适应性最强的译者;译者在翻译时充分尊重原文信息和原文生态,通过适应性选择译出符合目标读者接受心理的译文。针对译文评价,笔者认为适应翻译生态、接受效果好的译文才是优秀的译文。本研究还从方法、原则、策略等方面论述了陕西文物外译,引用了目的论、等效理论、关联理论,并辅以翻译实例来增强研究的效度。

由于陕西文物外译的理论资料相对稀缺,本研究也有两点未尽之处。其一,接受效果方面仅限于逻辑分析,没有实地对外国读者进行调研;其二,模式构建还不够完善,具体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还有待后期观察。随着中国与世界的

交流日益频繁,文物外译研究以后仍然是一个重点主题。后期可以展开以译本在不同国家产生的不同接受效果开展翻译国别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杨自俭.再谈方法论——《翻译方法论》序[J].上海翻译,2007(3):1-4.
- [2]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3] Nida E A, Taber C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United Bible Societies,1969.
- [4]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 [5]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University Park Press,1978.
- [6]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1.
- [7] 沈苏儒.对外报道教程[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 [8] Bassnett S, Levef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 [9] 王东风.翻译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2-8.

作者简介:胡学坤(1979-),男,中国湖北宜昌人,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地域文化对外译介的生态适应研究,项目编号:2025HZ0702);咸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理解当代中国”汉英翻译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3YB56);咸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多元系统论视角下陕西文学对外译介研究(项目编号:XSYK18041);咸阳师范学院基础教育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字化中学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sjxm202563);指导的创新创业项目:陕西红色文化双语视频创意传播路径探索(项目编号:xysfxy2025115)。